

這位老人心寒的人生歷程

文革他蒙冤入獄，出來時大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形成九十度。他就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躑躅街頭，乞討為生。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吧，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有誰知道，這個可憐巴巴的老頭子是哈佛大學博士、兩朝院士，清華物理系創始人——葉企孫教授（1977年含淚去世）。有心人拍照作為紀念！



葉企孫簡介：

葉企孫（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葉企孫，名鴻眷，中國20世紀著名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是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1918年6月畢業于清華學校畢業，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物理，1920年獲物理學士學位。同年9月葉企孫入讀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哈佛教授威廉·杜安與H. Palmer、葉企孫三人進行用X射線測定普朗克常數的實驗，于1921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論文“*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 h, by means of X-Rays*”（《用X射線法重新測量普朗克常數》），其數值精確到小數點後第2位。當時葉企孫主要研究方向是測量流體靜壓力對鐵磁材料磁化率的影響，研究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為他的博士論文于1925年發表。

1923年6月，葉企孫獲得哈佛大學物理

葉企孫老人令人心寒的人生歷程

學博士學位，10月到歐洲旅遊，1924年3月回到上海。

1948年，獲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1屆（數理科學組）院士。

1949年春，解放軍和平入城，葉企孫出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葉企孫被調入北京大學。

他是中國物理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幾次出任副理事長、理事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他也數次為熊大鎮案提議平反，有人認為這實際上導致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注：熊大鎮是葉企孫的得意學生，在抗戰期間在國共兩黨衝突中因失言被誣陷為“鑽入革命隊伍中的特務”，被處決。）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打擊者提出當年的熊案，而作為熊大鎮導師的葉企孫，在連國民黨黨員都不是的情況下，被誣為國民黨CC系（中統）在清華的核心人物。1967年6月，葉企孫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批斗、關押、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葉曾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幻聽。1968年4月，



中央軍委辦公廳正式對葉發出逮捕令，連續八次對其進行審訊，迫其多次書寫“筆供”，他只是回答“據吾推測……是因為吾對於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1969年11月，因為缺乏實質證據，葉被釋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統特務嫌疑”受隔離審查。

政府發給葉企孫每月50元生活費。這時他兩腳腫脹，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體彎成90度。1972年5月，北京大學對他作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6月恢復其教授待遇，也恢復了每月350元的工資，在北大中關村園給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廳的住房。

1975年隔離審查解除。

1977年1月10日，葉企孫侄子葉銘漢交工資給叔父，發覺他病情惡化。第二天葉企孫被送往北大醫院，又立即轉送北醫三院。1977年1月13日21時30分，葉企孫去世。

1987年，葉企孫的平反文件正式公佈。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

199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校友在清華設立“葉企孫

獎”。1992年，海內外127位知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提議為葉企孫建立銅像，1995年葉企孫銅像落成儀式在清華大學舉行，銅像安放在清華新區第三教室樓。

2000年，中國物理學會為紀念胡剛復等五位物理學界前輩，設立了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葉企孫）、吳有訓、王淦昌物理學獎；其中，葉企孫物理獎授予凝聚態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學家。

2010年12月7日，紀念葉企孫的同名話劇《葉企孫》在清華大學首演。

葉企孫被稱為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物理學界最早的組織者之一，對中國物理學研究、理科研究、教育事業乃至世界科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楊振寧、李政道、王淦昌、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朱光亞、周光召、鄧稼先、陳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學生，華羅庚也曾受到他的提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有半數以上曾是他的學生，因而有人稱他“大師的大師”。



一代宗師葉企孫的晚年（節選）——戴念祖回憶恩師

最好的老師

“葉先生自然科學造詣精深，而且對教書育人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他教學生查對文獻，往往在學生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就已經教會你了。比如說起某一本雜誌，講了什么事，他會把這本雜誌找出來，翻到要講的那一頁，指着某一段給學生講解文中含義，一邊計算。他不僅自己做到‘言必有出處’，也這樣要求學生。他會告訴學生做研究怎麼找書，如何查資料，翻書先翻看哪一部分。如今帶研究生的老師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就像是木匠師傅教徒弟一樣手把手地教你刨花，只要一次，學生就學會了。所以很多人都對他很難忘。”

提到葉企孫的教育方式，戴念祖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1958年，國內“大躍進”運動如火如荼。“第二年（1959年）開始，所里的不少人就不怎么做研究了，轉而寫一些科普文章在報紙上發表，賺取稿費。甚至有一個研究員幾乎不做研究，也不寫論文，專門寫科普文章。頗高的稿費標準使他每個月能增加不少收入。天文史組另一個研究員恰好相反，堅持讀書研究，葉老說什麼地方很重要，他就找來相關的著作研讀。葉老深為欣賞——如果大家都去寫科普不做研究，還要研究所干嘛？所以葉老在1960年的時候把這位研究員提陞了兩級，1961年又提陞了一級。這才讓其他人‘收了心’，意識到必須端正做研究的態度。”戴念祖說，葉企孫就是這樣教學生的：你做得好，他都看在眼里；做得不好，他也不會直言批評，但總有辦法讓你自已意識到。

天文史組的研究生叫陳美東，1964年葉企孫招收他的時候，很費了一番周折。戴念祖說：“當時前來報考的有三個人：第一個是大學青年教師，第二個在本所工作過、曾經是葉老的同事，還有一個當年的大學畢業生。三個人的考分在伯仲之間，相差不足十分。第一個青年教師考得最好，按理說應該錄取。第二個自1958年就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是國家分配來的研究人員。1961年，黨號召下放，當時我們所只有十幾個人，也得下放一個。經過動員，這位年輕人同意了。他被下放到廣西，由廣西再次分配。對他來說，聽從黨的指揮願意下放是很了不起的。所領導認為如果通過招生把他再調回所里，對日後展開工作很有幫助；再有類似需要下放的情況，動員工作會簡單很多。對被下放的他來說，也是成人之美。如此，所里的黨政人員都希望葉企孫錄取第二個。”

“第三個是當年的大學畢業生。葉企孫拿着三個人的試卷，沉思有日。最後他說，我就要這個大學畢業生。理由是，試卷上有一個題目，

這個大學畢業生用一種新的解題方法回答無誤，這種方法連葉老自己也沒有想到。葉老說，只有他可以造就，將來會有所建樹。這個學生就是陳美東。”

不出葉企孫所料，二十多年以後陳美東在研究中國古代曆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舉世公認的成就……陳美東研究中國古代曆法後，接二連三發表論文，日本人很驚訝，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研究更為出色。”後來陳美東歷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發表中國天文學史和科技通史方面的論文200多篇，對中國科學史尤其是天文學史研究作了很大貢獻。

戴念祖感慨道：“葉先生門下為什麼會出現那么多優秀的人才——五十多個院士，十幾個‘兩彈一星’元勳？就是因為他看人非常準，也有魄力。在一個‘一切跟黨走’的年代，錄取大家都不看好的陳美東是很難的。”

文革受難

質疑最高領袖沒有給葉企孫帶來劫難，一份



塵封三十年的檔案卻讓他在文革中歷盡磨難。

抗日戰爭初起的1937年，清華大學正緊張組織南遷，葉企孫帶着學生熊大鎮、錢偉長、葛庭燧等人到天津，運送物資。河北抗日根據地的呂正操將軍派人找到葉企孫，講述抗戰的困難：沒有槍支彈藥、沒有無線電發報機，請求葉先生幫助解決。葉企孫非常積極地支持抗日，並鼓勵自己的學生“上馬擊賊”。熊大鎮進入抗日根據地，並製造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枚地雷、第一支手榴彈。

第二年，“鋤奸運動”展開，指熊大鎮為漢奸。熊在嚴刑拷打下，承認自己是“CC特務”，並違心供認自己尊敬的葉老師是派遣自己來的“特務頭子”。熊大鎮被判處極刑，最終被殘忍地用石頭砸死，因為“子彈要留着打敵人”。

這份交代材料在檔案中靜靜躺了三十年，從河北運到延安，又從延安運到北京。文革爆發後，呂正操將軍受到批鬥，隨之葉企孫的“特務檔案”曝光。

戴念祖說：“在天津時，葉企孫要錢偉長大街小巷地找材料、零件，製造發報機；為了支援抗戰，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還挪用了清華南遷的萬餘元經費。他南下香港，向宋慶齡請求經費支持。到了重慶，還在寫河北省內的抗戰情況，號召醫生、護士、懂金融、懂政策，各行各業的人，到抗日根據地，支持抗日。”

1967年，葉企孫以“CC特務”的罪名被軍委辦公廳批捕。在關押期間，葉企孫受盡身體折磨和人格侮辱。由於大小便失禁，被褥終日潮濕，衣服少有更換。為減輕痛苦，他整日整夜坐着，致使兩腿腫脹，皮膚發黑變硬。

直到1972年5月，上面宣佈“葉企孫的問題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葉企孫才得到安置。此時的他，雙腿腫脹，步履艱難，

身患嚴重丹毒症。

最後的日子

聽說葉老師被釋放，戴念祖喊上陳美東，兩人打算一起去探望恩師。雖然獲得釋放，葉企孫仍然被關在北大不能隨便見人。“我和陳美東是偷偷去見他的。當時我們很年輕，想看望老師，連老師住在哪兒都不知道就去了。我倆騎着自行車，到了北大就在路邊等着，每當遇人路過就上前詢問葉企孫住在哪里，沒想到還真被我們給打聽到了。”

“見到老師的時候，葉老的身體已經不行了。見到我們，他記起了從前所里的事，便問：‘薄樹人（自然科學研究所天文史組葉老的學生）怎麼樣了？’接着把研究所的人近況挨個問了一遍。”戴念祖說。

從此，戴念祖和陳美東每個禮拜都會去葉企孫家中求教。葉老師還是給他們講授天文學史和物理學史。對於在被關押期間受到的審訊、折磨，葉企孫始終一字不提。老師不說，戴念祖也就不問：“我們想像過他會在裡面受什麼罪，吃什麼苦，可是不願、也不敢提，不想讓他回憶這些心酸痛苦的事。”

人生自非麋鹿，無計久同群。戴念祖的上門求教一直持續到1975年，“直到我自己出了事。正是文革結束前一年，我在跟別人聊天不

小心說了類似‘江青在上海如何如何’這種話。沒想到被人告發，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隨即批示‘逮捕戴念祖’。所以我立刻跟葉老師斷絕了關係，以免連累老師。甚至連他去世，我都沒能去送一送他。唉！”

“葉先生一生沒有成家，有一個周姓男護工，打從1930年代起就一直照顧他，替他料理家事。我們都叫他老周。葉企孫二十多歲學成歸國，忙着創建清華物理系，一直忙到三十多歲，還是沒有精力成家，大概四十歲時，梅貽琦幫他介紹，他卻說，都这么大年紀了，還結什么婚，這不是惹人笑話么。”

“沒能成家，他是把學生當親人、當子女。困難時期，他的助教營養不良，腿也腫了，他私底下跟助教說：‘明天早上到我家里來一下，有事。’第二天他叫老周把牛奶熬好了，指著助教說：‘這是張老師，你把牛奶端給他喝。’助教受此待遇，一時都緩不過神來。要知道，這是一份在困難時期專供教授的牛奶。看到誰穿的鞋破了，葉老趕緊掏出錢來讓你去買一雙新的：‘這個樣子哪能站講臺，有失師尊。’葉先生看來，老師一定得穿的整整齊齊，才能站在講臺上。那些二十七八歲的青年教師，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葉先生就像家長一樣叫你到家里來喝杯牛奶，補補身子。他領了工資，就跟年輕人說：‘都跟我們走，我請你們吃飯。’然後帶大家到新橋去吃一頓西餐。這種事，往往讓人一生都記得。對他來說這是很平常的事，因為葉先生無論對誰都是如此。他不會因為跟某個人關係好或者不好而有所區別，通通一視同仁。”葉企孫甚至邀請學生到自己家里同住，比如前文提到的熊大鎮，就受到此種待遇。護工老周的幾個孩子，是葉企孫一路培養，最終都送進了大學。

戴念祖回憶起唯一一次看到葉企孫享受“天倫之樂”的場景時說：“1974年春節，我帶着我的女兒去給葉老師拜年。他知道我大年初一會去看他，事先買了一大桶巧克力，拿餅乾盒子裝了，還給我買了大前門煙。在他的學生中只有我抽煙，他都記得很清楚。那時候買‘大前門’這種高價煙需要煙票，不知他從哪里弄來煙票。我一進門，就叫我抽煙。看到我的女兒，他高興地喊：‘老周，把巧克力端出來。’然後跟我女兒說：‘你自己抓，抓到多少都是你的。’我女兒那年不到五歲，我還從沒買過巧克力給她吃。她一手抓起來三塊，高興得發笑。我要她謝謝爺爺，她就趴在葉老的膝上，稚聲叫‘爺爺’。我抬眼一看，葉老鬚眉顫動，現出我從沒見過的笑容。這是一個老人在苦難時光中瞬間爆發的天倫之樂。真是遺憾，當時沒有照相機，可以把這一幕留下來。”